

## 致敬《白鹿原》 续写《大梁村》(下)

——一位后来者的创作思考

袁文贤

语言风格  
乡土方言与时代语境的融合

《白鹿原》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大量鲜活的陕西方言俚语的运用,让文字沾满泥土气息;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让每个角色栩栩如生。白嘉轩的沉稳持重、鹿子霖的圆滑世故、黑娃的耿直率真,都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说的“人做事不是做给旁人看的”,短短数字透着他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黑娃说的“学为好人”四字,道出他浪子回头的感悟。这种语言魅力,始终是我创作中的学习楷模。

在写作中学习,我注意了这三点。一是方言俚语的适度运用。譬如使用“编闲话”“白弄人”等方言词汇,以及“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等俗语。比如写于刚乾打井设备过河时,一位拉河人说:“都知道咱这儿有三精:精身子穿褂褂,精沟子穿棉裤,精脚子穿棉窝窝”,以此解释自己为啥光着屁股背人过河。譬如写席广田为制止儿子与梅梅往来,说道:“梅梅这娃太‘野’了,就不要和她黏(ran)了!”

二是追求语言的朴实。有人曾评价《大梁村》的语言“简洁明快,崇尚白描,祛除繁缛,拒空洞,弃浮夸”。写作中,我尽量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短句和白描手法。譬如写于恭让对方副社长直言:“说假话写假证明的都不是好东西,有瞎怂领导,也有不是领导的瞎怂,害了人还被提拔,这样下去就把人心给弄瞎了。这人啊,怪得很,要向好,就像修水坝,难得很;要学瞎,堤坝垮塌,稀里哗啦!”再譬如写闲聊场景。金文涛靠在炕边说:“谁给我装烟点火,我就给谁来一段好的。”闫老三接话道:“看把你自在活活的,都别理,憋死他!”金文涛瞪他一眼:“今天我就要你弄,你弄不弄?”闫老三回答:“不弄!”于是金文涛讲起闫老三的笑话:“喇喇嘴喇嘴,老三弹棉花,午饭没吃面,弦断回了家……为

啥?他生日要吃片片;为啥两天都要吃片片?他说他妈把他生了两天!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三是时代性语言的融入。譬如于刚乾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参与《资本论》是否过时”的辩论,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批驳反方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点:“《资本论》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从未失效,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分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延续与发展。”这段充满理论色彩的对话,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儒家说教形成对照,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和使命感。

贾平凹先生读完《大梁村》,先后三次作评论指出,《大梁村》“是优秀之作,生活气息极浓,语言朴实但有力”“人物鲜活,年份跨度长而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好作品,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有启示”“那确是本好书”。

文化变迁  
在时代转型中叩问精神坚守

《白鹿原》是本厚重的乡土文化百科全书:书中的祠堂原本是宗族权力的象征,却在时代大潮冲击下,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威严的族规失去约束力,家族的伦理秩序在崩塌;田小娥被封建礼教无情绞杀;朱先生追求的儒家理想化为泡影。随着革命思潮的涌动和战乱频发,乡村秩序被打破,年轻一代追寻新思想,农耕文明土崩瓦解,传统文化走向衰落。而我创作《大梁村》时在思考:如何呈现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我知道,这个新时代与《白鹿原》反映的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时代有本质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起,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瓦解,建立起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如此巨大的制度变迁,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巨大变化。

人民公社时期,有于刚乾、席广田这样一心为公的人,他们不顾个人得失,甚至把生死安危抛在脑后;也有像葛老大那样的“四不清分子”;还有自私自利

的尹宝石。为集体服务,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道德。当时评选先进,主要就看这个人爱不爱集体。反映这段历史,自然要展现这方面的矛盾,展示这种精神,而不能用现代的一些观念人为地“扭曲”他们。

所谓现代的一些观念,主要是受市场化的冲击,人们思想的变化,习俗的裂变,特别是物欲膨胀,人的自然属性被放大,社会属性在减弱,人性发生扭曲。丁锁柱靠关系承包了工程,通过造假牟取暴利;易建设利用手中权力,低价变卖国有资产,成了腐败分子;金玉秀婚姻不幸,又遭遇下岗失业,穷困潦倒,思想迷茫;尹宝石进城做生意,炒股票,亏得血本无归,怨天尤人等等。

在于刚乾、席广田身上体现的奋斗和奉献精神,现在到底怎么看?有人觉得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张扬个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不合时宜、过时了。冷丁先生在《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里,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形成做了很好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种精神坚守。我也很希望在自已作品里,把文化变迁中的这种精神坚守和矛盾冲突,能如实地呈现给读者。

结语  
致敬文学的人民性

创作《大梁村》,动笔时我并未意识到与《白鹿原》的关联,只有简单的心愿,就是想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留下一点东西。但在构思过程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我影响越来越大。我渐渐明白,所谓“致敬”并非形式上的模仿,而是要反映时代的真实模样,讲好这一代人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心声。

回头看,令我欣慰的是没有陷入对《白鹿原》的简单模仿。《白鹿原》以史诗笔触为农耕文明画上句号,而《大梁村》则试图在“后白鹿原时代”的语境中,探索乡土中国在新时期的文化巨变。从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扬,到改

革开放后个体意识的觉醒;从“于刚乾式”的理想主义者的坚守,到“易建设式”功利主义的沉沦——这些矛盾冲突并非刻意制造,而是中国乡村在转型期的阵痛。

有读者曾问:“于刚乾这个人物是否过于理想化?”

我的回答是:“理想主义从未过时,只是需要在现实土壤中找到根。”于刚乾听了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的汇报后,登门走访特困职工家庭,一进门,看到一位脸色发白、有气无力的女主人——她,就是于刚乾的初恋对象、卖血求生的金玉秀。——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

这或许也是《白鹿原》给予我的启示:真正的文学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

郁崇民老师通读全文,写下《一部凸显人民性的呕心力作》的文章。他说:“体现人民性的作品就是扎根土地,真实展现人民在历史中的状态和作用;而《大梁村》正是以辩证视角呈现特定时期人们的状况与作用,既描写他们的生活,更反映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体现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郁老师的评论,说到了我心上。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和冷丁老师的《一曲精神坚守者的赞歌》编入该书,编辑采纳了。

如果问《大梁村》最想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这份对人民性的坚守和表达。而这,或许就是对《白鹿原》精神的最好致敬!

写完此稿,我想起责任编辑王彦龙老师,他知识面广,认真负责、率直坦荡、直言批评,《大梁村》凝结着他的智慧和辛劳。在收笔时,我收到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读《大梁村》后写的评论《让我们学会哭泣》。想起半年前高老师为我泼墨题写的“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

心想:我这个人咋这么幸运,总遇到好人,这么多好人!



## 让人难以忘却的苦难而奋进的童年

——读李一长篇儿童小说《云上的孩子》

阎冬

对于“70后”“80后”的人来说,如果说童年是一首歌,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先生唱的《童年》;如果说,童年是一本书,那就是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这“一歌一书”寄托着这代人对逝逝童年的美好回忆,是他们苦难而奋进的童年的集体印记,既苦涩又快乐,是“被书包压垮了腰身”的现在孩子无法企及的、不一样的、令人难以忘却的童年。

近读我省女作家李一的长篇儿童小说《云上的孩子》,更加怀念我们那个没有多少作业、不上补习班、无忧无虑的童年。歌曲《童年》里有一句歌词: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李一用童真一样的清新语言、清泉一样的纯净情感、大山一样厚重的生活底蕴,向我们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一群坚守在大山深处,为了共和国国防事业的崛起,艰苦奋斗、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的“三线军工企业”职工及他们的孩子朴实而多彩的生活画卷。

在当下有些儿童文学创作趋于荒诞、变形、魔幻等远离生活、混淆是非的浊流之下,这部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品“带着泥土和花香”的清泉,冲击着儿童文学创作脱离生活的诟病,给了我们一份“回归生活和创作本质”的惊喜。这便是我读《云上的孩子》的最大感悟和收获。

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比较清晰,故事情节纯真有趣,虽然没有大喜大悲、惊天动地的故事,作者却以自然平实的笔触、真实饱满的情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生活在大山深处,“军工企业大院”的孩子们苦难而多彩的童年,以及他们的父辈们与城市企业职工完全不同的“三线生活”、奋斗历程和人生追求。典型性和现实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个“身处艰险不言苦”的特殊环境中,一代又一代三线军工企业职工为了国家国防事业,把“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奉献精神和以身报国的高尚情怀写进大山深处,成为那个火热年代的鲜明印记。

这是一段值得歌颂的历史,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童年。“工厂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因国防建设的需要,小说的主人翁沐小桃及她小伙伴的父辈们,从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来到秦岭深处,“这个到处都开满了鲜花的”自然花园式的工厂,就成了他们放飞梦想的家。

他们有着令人羡慕的城镇户口,却生活在被农村包围的军工大院;有着固定的工资,却与当地农民一样面临着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与城市的孩子们相比,沐小桃和她小伙伴的童年生活本身是艰苦朴素的,穿着补丁衣服,背的书包是哥哥、姐姐用过的,玩具汽车是爸爸用工厂的废料做成的,连吃个巧克力都是一种奢望。偶尔也有逃学被打屁股不堪回首的尴尬,但生活上的艰辛并不影响他们追求快乐。工厂大院和大山为他们提供了玩耍的广阔天地,背起书包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放下书包,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穿着露着脚趾头的鞋满山遍野地疯跑,摘野果、捉蛐蛐、抓“金牛”,用粘着蜘蛛网的竹竿捕蝉……所以他们从小便认识秦岭里的植物和野兽,懂得父母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

当然,也有年年岁岁学雷锋做好事的高光时刻,更有学校组织开展的体育、舞蹈、合唱、作文比赛等活动带来的体验式快乐。如果老师让以《我的理想》为题写作文,大多数孩子第一次都会写“要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当一个爱岗敬业、钻研技术的航空工人,生产研制更多更好的飞机”。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生活治愈童年。”李一用孩子喜欢的语言,选取三线军工企业这个典型环境告诉我们:“沐小桃”拥有一个童趣盎然、色彩斑斓、快乐上进的不一般的童年。从成长的足迹看,丰富多彩、无忧无虑的童年无疑让“沐小桃”成为“脚踏大地又仰望星空”的“云上的孩子”,他们既在大山里成长,又在大山里放飞“航天报国”的梦想。这样的童年是当时城市孩子陌生的,现在孩子没有的童年,是让经历过的这个时代的人,难以忘却又融入生命能够享受一生的集体财富!

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后,我国的国防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比肩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成就。其中就有“三线军工企业”职工的长久坚守和超常付出。我是从西安东郊一家军工企业走出来的职工作家,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军工题材的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我佩服李一的勇气,更赞赏她独辟蹊径的做法。

其实,早在我编《陕西工人报》新闻版时,作为企业通讯员的李一经常给我们报纸投稿,因此她称我为老师。在文学创作这条寂寞的大道上,她从写新闻稿,到写散文、诗歌、小说,特别是近年专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云上的孩子》《杜鹃如火》《春蕊》《纸香》《麦冬》等30余部,涉及长篇小说、中篇童话、儿童故事、儿童散文等不同体裁,作品多次入选省市重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其中,小说《烈火铜铃》入选江西省读书活动,小说《永远的达瓦》获得2021年度冰心儿童文学奖,童谣《新疆棉花亚西西》荣获第十届中国童谣大赛一等奖。可谓是佳作不断、成绩斐然,把我这个老师顶了几条街。

唐代诗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用这句话安慰自己的同时,衷心祝愿李一在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作出更多“沾满泥土、带着露珠、童趣盎然”的精品力作。

## 认真的马士琦

王新民

屈指算来,认识马士琦兄已经很久。那时我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业余结合工作写点书话书评。远在东郊做航天公安工作的马士琦兄,那时也喜爱图书并写书话书评。他常到位于北大街十字的出版大院,渐渐与我和孔明等就熟识了。

他每到我的办公室,便问编辑出版了啥新书,一边说一边就用敏锐的眼神搜索书柜,一旦发现新书,立马拿起来翻看。我很感动他的爱书之情,即赠他指正,也希望他最好以文字的形式予以评论。不久,他就写出大有见地的评论文章。记得当时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省

图书评论学会联合陕西日报社和西安晚报社开展“我喜爱的陕版图书”书评征文活动,我们都参加并获奖。

后来我离开出版社调到出版局工作,与马士琦兄来往少了一点。记得1998年秋季,在母校西北大学召开拙著《贾平凹打官司》座谈会,到平凹先生寓所请他出席,适逢马士琦兄请平凹看他的书法作品。得知要开座谈会,他说:“你老弟也不通知我一声,见外了。”

我说:“这是策划发行人一手操办的,不过是个几个文友闲聊,你住那么远,不便惊动。有缘相会,那就一块过去。”于是我们边聊边向座谈会会场走去。

退休以后,我因为编校书稿,有几次在孔明办公室与马士琦兄见面,他曾和我交叉审校方志,看得非常认真仔细。他的深厚学养、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令我感动,也值得每位出版工作者学习。

前不久,我将策划出版的大学恩师武复兴先生遗著《说不尽的长安城》赠给马士琦兄,并请他评论。不久,他就写出了《一书在手 精读长安——赏荐武复兴先生〈说不尽的长安城〉》的长篇诗评,开篇写道:“槐月得书,历时细览,心无旁骛,十日阅完。远古至今,百万余年,三千典籍,送之不完。复兴馆长,提纲精研,茶聚菁华,一卷收全。渊博学识,书

页尽展,故事精当,诗词级点。史料翔实,一目了然,观点精确,启人豁然。以叙事,事件明辨;以事说人,人物彰显。”可谓高度评价。

我曾邀请马士琦兄参加陕西真元文学社组织的文学活动,他不仅积极参加且捐赠墨宝。在此要写一笔的是,马士琦兄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有骨有筋,刚柔并济,自成一家,声名远播,其墨宝《砺剑》《佛》等被刻石,不少作品被博物馆收藏。

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夫。不知不觉,马士琦兄已迈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愿他宝刀不老,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书话书评和书法作品。

## 书人书事

## 一部精彩纷呈的历史存证之作

——读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魏锋

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皇朝,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他打造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强势高峰,汉朝因此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为了感性具体地书写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画卷,为了留给读者的不仅是再现了西汉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弘和璀璨,也为了还原汉武帝时期的民族精神,杨焕亭先生经过6年的求索和耕耘,终于完成了《汉武大帝》。

《汉武大帝》在结构上精心布局,以人为核心去结构故事,去塑造形象。该书以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通过以汉武帝刘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命运历程,全景式地、历史地、多侧面地、艺术地再现了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西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绚烂图景。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杨焕亭先生处理好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达到了历史目光与人间情怀在艺术层面上的统一。因而,让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

该书还有一个最大看点:《汉武大帝》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真实的虚构,改变了传统文本把汉族与少数民族战争单纯看作汉武帝文治武功的观念,着力表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各民族发展交流、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在表现手法上,不被文学创作中的各种“主义”所束缚,

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汲取现代主义、意识流以及影视文学等多种手法。战争中前方与后方的时空交错,情爱中灵魂与灵魂的真爱絮语,人物意识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穿梭,无疑增强了在理念上的前瞻性和艺术上的可塑性。

多年来,我见证了杨焕亭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的创作,这不仅是陕西长篇小说的重要文学收获,更是当今中国文坛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汉高祖》是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史诗。《汉武大帝》先后多次增印,被评为“湖北省‘五个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奖”,并被推荐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列入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丛书。《武则天》也先后多次增印,并推出了长篇历史小说珍藏版。

《汉武大帝》以厚重的文笔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光影熠熠的历史画卷,是近年来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又一项重要收获,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熠熠生辉的新葩。更值得推崇的是,《汉武大帝》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汉武帝,留下了难得的文化史料。

我仅凭管窥之见,向读者们系统和完备地介绍这本书的魅力。我坚信,只要是读过《汉武大帝》的读者,一定会期待读杨焕亭先生的下一部历史小说,也一定能从他的作品中品味到独特的见解,体悟他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杨焕亭先生潜心创作,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在三卷本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的第一时间,我慕名采访并结识至今,亦师亦友,一路见证着杨焕亭先生对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坚韧和毅力。

“陕西这方土地真是太厚重了。它使我对历史有着一种本能的也是理性的敬畏,那些曾经驰骋山川的金戈铁马,那些曾经气吞万里的英雄主义,那些厚德载物的人文火焰,一次又一次地激发我的创作激情。”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品读这部历史小说。读完后,觉得《汉武大帝》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历史存证

之作,它的历史价值、思想内涵等令人震撼。正如评论界所言:《汉武大帝》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